

爲了父親的尊嚴

一個社會的貧富懸殊，會直接影響下一代的教育質量。所以讓每個孩子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一直是德國大眾很關注的問題。

爲了讓低收入人群的孩子和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樣，能夠在課餘時間學音樂，參加體育俱樂部，參觀博物館、動物園，德國斯圖加特市通過了一項特別提案：每年給每個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課餘教育補貼。爲了確保這筆錢“專款專用”，政府採用了發卡的方式。這張卡只有在城市的博物館、動物園、劇院，或者指定的音樂學校和體育俱樂部，才能夠進行刷卡消費。

這麼好的提案，應該皆大歡喜吧？

誰也沒有想到，最先提出抗議的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父親。他們認爲，這種方式聽起來動人，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歧視，有損他們的尊嚴。設身處地爲這些父親想一下，在博物館、動物園和劇院買票的地方，作爲一家之主的父親掏出這張卡消費，就等於告訴周圍所有人：他們是窮人，他們的孩子在享受社會福利。

如果孩子還小，可能不會在意這些細節。但年長一點的孩子，會對把自己看成窮人的孩子很敏感。

作爲一個社會人，他可以低三下四地爲五斗米折腰，可以失業，也可以領取救濟金。但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應該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應該是孩子崇拜的對象。

德國基本法的第一條是：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作爲一家之主的父親的尊嚴，就更加神聖不可侵犯。政府部門趕緊再一次討論，最終通過一個新提案：每一個孩子，不管父母收入高低，都能得到一張這樣的文化消費卡。也就是說，用這張卡消費的父親，有可能是一個百萬富翁，也有可能是一個正在領取失業救濟金的窮人。

這樣一來，窮父親的尊嚴保住了，富父親也意外地享受到社會福利，窮人富人皆大歡喜。不歡喜的是財政部，這又多了一筆計劃外的支出。（作者 程璋，圖 王青）



父親豐子愷對自己的居住條件並不講究，所用傢具器什都很簡單樸素。但在美化生活環境方面，他特別重視。

有一次，他看到蚊帳上破了一個洞，就畫了一個玲瓏可愛的小圖案，叫我綉在白布上剪成圓形補上去。這樣一來，別人看了不覺得那蚊帳有破洞，還以爲上面原來就有一個美觀的小裝飾。

還有一次，我發現家里窗玻璃的一角被

別開生面的環境美

碰破了，正要用厚紙去糊，父親見了，馬上阻止我說：“這很不雅觀。”說着就用白紙裁出一角，在上面畫了“一枝紅杏出牆來”的題材，貼在玻璃窗上，不僅補了那一角，還給人以美感。

我家有一把小衣刷，背面原來嵌着一面橢圓形的小鏡子，日子久了，那面鏡子破裂，脫落下來，刷子露出底板，給人以殘缺之感。父親看了，覺得很不舒服，便用白紙按鏡子的大小裁出一個橢圓，在上面題了幾句詩，貼在板刷背面。這以後，每次使用板刷時，不但沒有殘缺感，還可以順便欣賞一下詩句呢！

父親不喜歡殘缺破損，更討厭俗氣。記得抗戰前，我們住在浙江故鄉的綠緣堂時，我的一位姨媽送來一張印有時裝美女的月份牌，並親自把它掛在父親書房的牆壁上。父親十分討厭，等姨媽一走，就說：“叫我看她一年，怎麼受得了！”便自己作了一幅以“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爲題的小型彩色畫貼上去，遮住那個俗不可耐的“美女”。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親曾給家里的自鳴鐘開了一個玩笑。抗戰前，父親從上海買了一

只圓形大自鳴鐘，掛在綠緣堂的客廳里。沒過幾天，他就對鐘面上那些枯燥乏味的數字感到厭煩。他把自鳴鐘從牆上取下來，用油畫顏料把鐘面塗成天藍色，添上幾條碧綠的柳絲，又用黑色硬紙板剪出一對飛燕，粘在時針和分針的尖端。這樣一來，時鐘和分鐘走動時，就變成一雙飛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這給我家的客廳平添了無限的詩情畫意。孩子們對它感到特別新奇。開頭幾天，我們兄弟姐妹幾個人常以此比賽猜時間。眼力好的，半分鐘就能辨認得出來。日子一長，連大人也習慣了，只要一望，便知道是幾點幾分。可是對鄰居們來說，這簡直成了新鮮奇聞。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不久鎮上的人幾乎都知道了。有的說：“到底是藝術家，做起事來與衆不同。”有的還特地跑到我們家里來見識見識這只“稀奇的自鳴鐘”。

藝術家是愛美的，然而美絕不等於豪華或艷麗。簡單樸素的環境，藝術家可以使之美觀；殘缺不全的用具，他也能妙手回春，使它別具詩情畫意。用這樣的辦法來美化環境，倒真是別開生面呢！（作者 豐苑音 圖片 豐子愷家中的自鳴鐘）

去看大好河山的年輕人

暑假期間，朋友忽然問我在天安門看升旗的事情。當時我正忙，隨口說：“太麻煩，別去了吧。”她毅然說：“不行。這是我一年前給孩子許下的承諾。”

之前電影《無問西東》熱映的時候，她帶上初中的兒子去看，孩子對清華一見鍾情，立刻確定了高考目標，誓要進入牛人的行列。朋友心中暗喜，嘴上卻說：“這志向太小了，你爲什麼不想上哈佛？”

不料，兒子板起臉來說：“清華已經是中國最好的學校。如果它不是世界最好的，只因爲它的歷史還短。做科研出成績都是需要時間的，百年樹人，大師也不是一天就能練就的。”她第一次發現，兒子嘴角隱隱發青，那是即將長出來的鬍鬚。已經高她一個頭的兒子，此刻以成年人的姿態，莊重地與她對話。之前一整年，孩子都在爲中考而拼搏。到了今年暑假，孩子是揣着好成績出發的。

我的另一個朋友向我苦笑道：“我被拋棄了。”這個夏天，她上大二的女兒要去新疆支教。女兒的學長們和新疆的一些支教機構一直有聯繫，每年暑假都會去開短期集訓班，讓當地的孩子們有機會聽一下相對純正的英音、美音，看一下物理、化學實驗是怎麼個做法。

每一個去過的人，回來後都會感嘆，原來連一杯奶茶、一塊雞排、一張可以無限量借書的圖書證，都是一種福利，並不是人人生而有之。支教對體能、成績、性格、口才都有要求。朋

友的女兒知道自己被選中後樂得一跳三尺高。但無數問題涌到朋友的嘴邊，她問女兒：“你們去多少人？你懂什麼，能幹什麼？有水嗎？有電嗎？有Wi-Fi嗎？”女兒終於忍不住大聲叫停，她挺直腰板，像公司里新來的實習生一樣，有板有眼地告訴媽媽：“一切都已準備妥當。當地的學生，從來沒機會看到現場版的英文戲劇。他們不會嫌我差，我也不用面對挑剔的觀眾，我們彼此都在給對方機會。”

我的朋友被說服了。萬里疆土，女兒會看到什麼、領悟什麼，又會播種什麼、留下什麼，都不是她能幹預的。當地圖上的名詞變成現實場景，當圖片上的落日發生在眼前，她相信，女兒對“中國”的理解一定很不一樣。

今年以來，我聽到許多這樣在路上探索、學習的故事。有人帶着孩子進行古都之旅，將第一站定在了洛陽，兩千年前東周就在那里建都。他們將終點定在北京，在陳子昂說的“前不

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處。另一隊我認識的年輕人在延河之旁駐下來。他們中，年紀最大的在讀研，年紀最小的不過是初中生。

這些事情讓我想到，愛是什麼呢？是想瞭解，想觸及，想擁你入懷。愛人如此，愛國亦然。你怎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長，卻不知道每一寸土壤之名？若你不曾用自己的雙足探索它，你怎麼能發自內心地說：“我愛這美麗的大國。”（作者 葉傾城）



污名與禁忌不再：當歐洲人終於開始戴上口罩

巴黎直到幾周前，巴黎還只有亞洲遊客戴口罩，隨着新冠病毒開始席捲歐洲，這引起了法國當地人的困惑、懷疑，甚至敵意。

爲控制疫情而舉國封鎖四天後，法國政府發言人茜貝特恩迪亞耶(Sibeth Ndiaye)警告，人們對口罩太不熟悉，從技術上說，戴口罩難度太大，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甚至在周四上午，當被問及她有沒有戴口罩，或者有沒有讓孩子戴口罩時，她還說，哦，沒有，根本沒有。

口罩禁忌正在迅速消失，不僅是在法國，在西方各國都是如此，因爲越來越多的專家表示，這種做法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是有效的。

對西方國家來說，這種轉變意義深遠，不僅需要克服後勤挑戰，確保足夠的口罩供應（這個挑戰已經夠大了），還需要克服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阻力，甚至是與戴口罩有關的污名一些西方領導人直接把戴口罩的人說成異類。

看起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法國和美國一樣，先是勸阻人們不要戴口罩，現在開始敦促本國民衆在室外戴普通的或是自製的口罩。歐洲一些地區比美國動作更快，他們不是簡單地建議戴口罩，而是要求人們戴上口罩。

本周，奧地利成爲繼捷克、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之後，第四個要求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歐洲國家。

本周三，位於巴黎南部的小城索鎮(Sceaux)成爲法國第一個要求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的城市。違反者將面臨38歐元(合41美元)的罰款。法國南部城市

尼斯宣佈，將在下周強制人們使用口罩。巴黎市長周二表示，將在该市分發200萬個可重複使用的布口罩。

意大利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而倫巴第是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周日，該市強制要求人們在戶外佩戴口罩。

在法國，很多人堅信人們會從文化上抵制這種做法，並且相信必要時可以迅速進口口罩，這樣的想法導致了口罩嚴重短缺。在過去十年，法國口罩的國家儲備從驚人的17億個減少到這個大流行病開始時的1.5億個。

有關口罩本身的討論，有時演變成關於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的更大討論，將西方的個人主義與亞洲的集體主義對立起來。

特朗普總統宣佈美國疾控中心現在支持廣泛佩戴口罩時，卻表示自己不會戴口罩，似乎就體現了這種矛盾心態。

專門研究流行病的法國人類學家弗雷德里克凱克(Fredric Keck)說，在西方，人們以個人主義角度看待戴口罩的問題。

外面有病毒，所以我戴口罩只是爲了保護自己，凱克說，而在亞洲社會，集體主義理性說，我戴口罩是爲了保護別人。

這種心態上的差異至關重要，因爲除了最高防護級別的口罩外，其他所有口罩都具有同樣的性質：人們認爲，口罩在保護佩戴者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尤其

是在擁擠的空間里，但它在降低病毒通過咳嗽或說話傳播的風險方面，效果才是最好的。

法國政府最初表示，絕大多數人不需要戴口罩，因爲它們並不能保證佩戴者的安全。而亞洲和幾個歐洲國家的邏輯從根本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社會就會得到保護。

周一，奧地利在超市和藥店強制實施口罩令，下周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也必須佩戴口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表示，這一變化是一個重大適應過程，因爲在我們的文化里，口罩是陌生的東西。

然而，直到2003年SARS之前，口罩對於亞洲也是陌生的。在日本，當人們習慣了戴口罩後，會繼續用它防禦季節性過敏或保護彼此免受細菌侵害。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戴口罩抵擋空氣污染不同，儘管沒有面臨直接威脅，在日本戴口罩仍是很常見的事情。

位於東京的環境諮詢公司環境控制中心(Environmental Control Center)的口罩專家飯田幸子(Yukiko Iida)說，戴口罩已經成爲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現在它在維持日本社會總體的安心感中發揮着作用。

戴上別人，咳嗽起來不會給其他人帶來不便，飯田說。你在向別人表明你是遵守社交禮儀的，這樣人們就會放心。

關於口罩的辯論聚焦在西方和亞洲之間的文化鴻溝上。但是即使是西方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尖銳的分歧。

3月18日，捷克成爲歐洲第一個強制要求戴口罩的國家，隨後是3月25日的斯洛伐克。儘管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戴口罩的習慣，但兩國民衆都在家動手縫製口罩，而且還經常把口罩送給醫生、護士和售貨員，或者將口罩放在門口供路人使用。

專家說，斯洛伐克和捷克能比較迅速地接受口罩，部分原因是他們有着強調集體主義的共產主義遺產。

布拉迪斯拉發政策研究所(Bratislava Policy Institute)的社會學家米哈爾瓦薩茲卡(Michal Vasecka)說：人們學會了在關鍵時刻服從。

相比之下，在個人主義意識更強的法國，即使是政府官員，一直以來也對戴口罩防禦潛在流行病持悲觀態度。實際上，法國對口罩的文化抵抗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在2011年成爲第一個出于安全考慮禁止在公共場合遮麵包括穆斯林面紗的歐洲國家。

法國參議院在2010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遮面的做法遭遇了短期內無法克服的文化阻力。它還說：戴口罩更多被視爲污名，而非個人或利他的保護做法。

儘管法國政府尚未強制規定戴口罩，但像醫學科學院這樣的強大組織還是建議必須戴口罩。

馬太說，這次疫情結束後，流行病期間戴口罩很可能在西方國家成爲常態，他還說：我堅信，每個家庭成員很快就會常備兩到三個可重複使用的口罩。

